

# 9-13世纪西藏文化繁荣动力机制探究

孙昌涛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9-13世纪是西藏历史上继吐蕃政权之后又一次的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形成了西藏文化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探讨这一时期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可以从两方面予以分析：外部影响机制和内生增长动力机制。不同时期文化的繁荣兴衰，其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和规律性，通过集中分析这一时期藏族文化的发展和嬗变，梳理西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独特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文化繁荣；社会经济；思想自由；文化融合；机制

## 前言

自吐蕃王朝（842年）崩溃后，青藏高原上一直未能建立起统一政权，史称分裂割据时期，前后共持续了四百年时间。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后世藏族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学界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藏传佛教复兴为主线的后弘期，但对于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却少有分析。这一时期佛教再度发展，形成了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众多教派。各派教法经过广泛传播创造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对西藏社会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分裂割据时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背后往往蕴含着社会大背景的变化，这种变化多是由外因影响，内因主导，这一时期的藏族文化不仅充分借鉴吸收周边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更在吐蕃文化的基础上积极适应时代，内在地更好传承源文化，形成了既不失特点又与其他和谐共生的文化。

## 一、奴隶制下的王田分封：向封建化的渐进转型

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吐蕃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此王（朗日伦赞）之时，有琼保·邦色者，割藏蕃小王马尔门者之首级以藏蕃二万户来献，（其土地民户）

均入于赞普掌握之中。‘苏孜’者（既琼保邦色之又名）诚为忠顺之辈。此后，伦赞赞普以苏孜忠顺可靠，乃将藏蕃二万户悉数赏赐予之。<sup>[1]</sup>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王田制度作为吐蕃奴隶制社会的基石，承载着独特的经济功能和社会结构。在这一制度下，赞普持有土地所有权，通过封赐的方式，将土地与牧场授予贵族和臣属，后者仅享有使用权，且这种权利随时可能被赞普收回，从而确保了王权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奴隶制的发展不仅强化了社会等级秩序，也推动了吐蕃社会的历史进程，成为其早期繁荣的重要动力。

然而，随着政权的扩张，社会内部矛盾逐渐显露，尤其是社会阶级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奴隶制的固有局限开始显现，成为制约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面对这一挑战，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渐进式的改革，旨在缓解奴隶制中的不合理因素，同时保障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其中，“绿册”制度的引入尤为关键，它通过定期登记平民的户籍和耕地面积，而吐蕃王室向其征收一定数量的赋税。<sup>[2]</sup>实现了在自由民之间公平分配土地和牲畜的“平均财富”政策，从而维系了一定的社会稳定。同时，王室亦借此征收赋税，确保了财政收入的稳定。

尽管如此，奴隶主贵族对于赞普分配土地的不满持续发酵，他们私自派遣奴隶开垦无主荒地，私田的不断扩展削弱了王田制度的根基。随着私田规模的扩大，奴隶主贵族将更多精力投入于私田管理，这无疑是对王田制度权威的挑战。加之，连年的对外战争加重了奴隶的负担，加剧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冲突。最终，朗

**基金项目：**西藏大学2024年“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博士研究生项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青海同仁六月会中的匝嘎利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昌涛（1994-），男，汉族，河南濮阳人，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史、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

达玛赞普遇害，其二子争夺王位引发的内讧导致王室分裂，吐蕃王朝的崩溃成为历史的必然。奴隶起义的星火燎原，彻底瓦解了王田制度，为新型的封建土地制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奴隶起义犹如“一鸟在空，众鸟飞从”，<sup>[1]</sup>王田制度已经名存实亡，新型的封建土地制度代之而起。分裂割据的动荡时期，标志着吐蕃土地国有制度的终结。随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普及，自耕农与佃农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与人身自由，激发了劳动生产的活力，催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新兴的封建农奴主与封建农奴阶级应运而生，逐步确立了以领主占有制为核心的封建农奴制度。这一转变不仅促进了农业与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经济的剧变是推动文化繁荣的关键外因，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即将发生。

## 二、割据政治孕育繁荣：文化普及化的历史进程

吐蕃政权解体后，统一的政治架构土崩瓦解，代之以诸多割据势力。“母后派系的臣民相互对峙，各自拥二王子为王，云丹占据卫茹，威宋占据天茹，卫天之间时常发生火并。其影响几乎波及全藏区，在各个地方也随着出现了大政、小政、众派、少派、金派、玉派、食肉派和糌粑派等派系，互相进行纷争。”<sup>[4]</sup>

吐蕃王朝崩溃后，统治阶级对学术的控制减弱，这为文化下移和知识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各地方势力对学术的限制大大减小，十分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形成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sup>[5]</sup>”，学术氛围相对自由，知识的受众日益增多，知识迅速大众化、平民化。

分裂割据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藏民族积极吸收周边文化。玛尔巴译师三次前往印度学习佛教教法，回国后广传教法，开创了噶举派<sup>[6]</sup>。同时，南亚次大陆的分裂和伊斯兰教的入侵，使得大批佛教徒流亡西藏，为藏传佛教的兴起提供了支持。阿底峡大师应拉喇嘛益西沃的邀请来到西藏，并广收弟子，著名的有仲敦巴、俄·勒白喜绕等，其中“像仲敦那样伺候谁也办不到。如果有一个抓住阿底峡规矩的，那就是他仲敦了”。<sup>[7]</sup>1056年，仲敦巴在热振地方修建热振寺，噶当派由此形成。各个割据势力为了扩大实力，纷纷延揽人才，为已所用。形成了一种本能的自由文化制度。

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同一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密切相关，但并非所有社会变动都能带来文化的繁荣。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前期，虽然社会正经历转折，但文化并未有重大发展。然而，在分裂割据时期，从统

一向自由转变的社会环境中，自由的知识制度开始深刻影响西藏文化，游学和佛法辩论等风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流动和知识的传播，为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自由的知识制度使得知识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而是逐渐普及到更多人群之中。

从西藏分裂割据时期的社会及其政治变动来看，一是分裂割据造成了和而不同的开明政治，二是思想不统一造成的舆论自由，为分裂割据时期的思想文化变动和后来的文化繁荣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 三、新兴的藏传佛教：文化融合与本土化

分裂割据时期的西藏历史标志着社会与文化的重大变革、显著发展及深刻转型。此阶段的文化发展，虽根植于吐蕃时期的文化传统，但并未实现对原有文化的全面超越与根本性改变。这一时期西藏政治上四分五裂，而文化并未割裂，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sup>[8]</sup>自吐蕃王朝伊始，佛教文化即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域广泛传播。分裂割据时期的文化发展，亦以佛教本土化为基石，通过佛教与本土实际的深度融合，旨在构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故分裂割据时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从吐蕃时期的苯教、佛教和土著文化中续演而来，分裂割据时期形成的藏传佛教是吐蕃文化思想的承继与细化。

在藏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吐蕃时期的苯教与佛教既斗争又融合，形成本土化佛教；分裂割据时期佛教彻底本土化，藏传佛教主要教派相继形成，直至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佛教在藏族历史社会中确立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各类文化形式亦多以佛教内容为核心。由此可见，佛教与藏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思想文化转型，其基础在于对吐蕃文化的吸收与选择性摒弃。吐蕃王朝之前，藏族尚未形成一套系统且成熟的文化体系。直至吐蕃时期，藏族自上而下地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文化系统，其显著特征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在佛教大规模传入青藏高原之前，藏族多信奉苯教。苯教在统治阶层中享有崇高地位，“古辛”甚至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军事决策。然而，随着古辛权力的不断扩张，对赞普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导致止贡赞普采取大规模措施禁止苯教，苯教的发展因此遭受了严重打击。<sup>[9]</sup>但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苯教在青藏高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赤松德赞时期，思想界发生了两次重大斗争，均与佛教紧密相关。首次为佛苯之争，双方通过辩论、著述等多种形式展开激烈交锋。在赤松德赞的坚定支持下，

佛教最终取得胜利，苯教则遭遇挫败。苯教徒被迫改信佛教或流亡边地，“苯教徒被放逐于西藏各地……其教义因而得以流传”<sup>[10]</sup>这标志着苯教第二次受到统治者的打压。后来也发生过几次佛苯之争，可以看出，苯教影响虽广，但一味排斥佛教，也为苯教的衰落埋下了祸根。第二次是顿渐之争，而渐门派僧人多代表吐蕃王室，胜负早已决定，“益喜旺波将和尚之见解与菩提萨埵之见解、渐门之教理如实完全向赞普奉禀，赞普……一再言道：‘益喜旺波真是我阿闍梨！’向之叩首礼足。”<sup>[11]</sup>最后渐门获得胜利，为吐蕃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以后，吐蕃佛法沿着中观宗一派传播。

自佛教传入，赤松德赞灭苯兴佛，吐蕃佛教的发展受到统治阶级上层的影响比较大，佛教并没有在广大下层民众之间传播开来，都是统治阶级上层通过对原有统治思想的改变，努力构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系统。

#### 四、吐蕃文化基石之上：传播与发展的多元路径

在藏文诞生之前，青藏高原的文明形态相较于周遭地区略显原始，社会结构与制度亦处于初成阶段。然则，伴随吐蕃军事实力的扩张，与邻近国家的互动愈发紧密，由此催生了对周边先进文化和制度的深度汲取。王室派遣青年贵族“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sup>[12]</sup>得以亲历并悉心观摩中华大地的军事雄风与礼乐文明。吐蕃朝野上下积极求索《毛诗》、《左传》、《文选》<sup>[13]</sup>等汉学典籍，同时延请高僧大德莅临弘法，这些举措均为吐蕃文化体系的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此番向先进文化取经的实践，延续至分裂割据时期。

14世纪中期，西藏本土佛教各派系已构筑起独具特色的教义传承与修行体系，展现出藏传佛教多元而统一的特性。“至分裂割据末期，正值西藏佛经大规模翻译活动的尾声，汉传佛教与印度佛教向西藏的广泛传播亦步入终结。”<sup>[14]</sup>藏族文化自此步入成熟阶段，形成了兼备民族个性与世界视野的文化体系，彰显了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 结论

在9—13世纪，藏族文化的繁荣不仅是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体系构建完成的标志。这一时期，藏族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昌盛紧密相连。此外，藏族文化的成熟和定型，显示了其内在的相通性

与共同性。在民族精神层面，藏族文化表现出了显著的共同性和传承性。从雅隆鹄提悉补野部落时期到分裂割据时期，尽管民族文化在内涵与形态上有所差异，但这些差异是文化适应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形式虽变，文化内核却始终如一。

藏族与其他民族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和多样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机制，可以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 参考文献

- [1] 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年.
- [2] 王辅仁、索文清. 藏族史要[M]. 四川: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1年.
- [3] 王忠. 松赞干布传[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
- [4] 巴卧·祖拉陈哇、黄颢译. 贤者喜宴译注(十六)[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1期.
- [5]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等译.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 西藏: 西藏古籍出版社, 1996年.
- [6] 孙林. 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和特征[J]. 中国藏学, 2002年第2期.
- [7] 段克兴译. 《阿底峡尊者传》[M]. 兰州: 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
- [8] 泰勒著、蔡江浓译. 原始文化[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9] 黄维忠. 西藏分裂割据时期的文化并未割裂[J]. 北京: 中国藏学, 2015年.
- [10] 才让太、顿珠拉杰. 苯教史纲要[M].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
- [11] 黄明信. 黄明信藏学文集: 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年.
- [12] 王钦若等著. 册府元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 [13] 刘煦等著.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年.
- [14] 李冀诚. 西藏佛教夏鲁派祖师布顿大师及其著述[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9年第4期.